

守正开新 协同引领

——访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本报记者 洪伟成 实习生 黄思宇

根据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媒体《艺术新闻》公布的排名,上海博物馆以2013年全年194万参观人次在全球艺术博物馆中排名第23位,位列中国第二。在每日限流8000的前提下,2014年上海博物馆全年参观人数首次突破了200万人次,创开馆以来新高。近年来,莫奈、梵高等轰动一时的展览步入商业平台,而台北、北京故宫相继推出“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上海博物馆又在通过什么方式延伸其影响力?在“十二五”规划收官在即、“十三五”即将破题之际,走过了一个甲子的上海博物馆又在做何种筹划?日前,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阐述了上任以来所秉持的“守正开新,协同引领”八字办馆理念。

守正开新 做有关怀有视野的展览

2014年12月12日,杨志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接任上海博物馆任馆长。与前任馆长陈燮君交接时,陈燮君送给杨志刚一句话:“尊重博物馆工作规律。”杨志刚将之概括为“守正”:博物馆有自己的工作规律和领域;同时,博物馆不是与世隔绝的,上博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积极入世、有着现实关怀的人。“开新,则是要研判新的趋势和新的格局,树立国际和国内的博物馆发展的两个坐标体系,开创新的局面,继续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把基本的业务工作做扎实。”杨志刚表示。在他看来,现代化管理体系、充满精神活力的人才高地、极具传承创新能力的学术高原,最终都是为了源源不断地推出一流的展览、最好的展览。陈列布展是博物馆的核心产品,也最终体现了博物馆的存在价值。

去年年底,上海博物馆组织藏品参与国家博物馆“丝绸之路”大展;同时,



上海博物馆内络绎不绝的访客,2014年上海博物馆首次突破全年200万参观人次,创开馆以来新高。(上海博物馆供图)

上海博物馆举办“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出土壁画艺术展”。杨志刚认为,这是博物馆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积极回应,并强调这一工作理念将在今后继续得到体现。今年,上海博物馆的首个展览缘于纪念我国著名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和文化艺术界领导人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1991年,夏衍将在“文革”中被抄发还的233件珍贵邮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2009年,夏衍长女又将父亲留下的7000余件邮票悉数捐出。“展览不仅是中国邮票发行历史面向大众的一次回顾,更是对夏衍先生慷慨义举的感恩。”杨志刚说。而7月3日,新近开展的“盛世威仪:俄罗斯皇家军械珍藏展”集中展示了来自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201件、近120组精品,系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镇馆之宝”。“中国的孩子很需要补上世界的眼光、多元的文化观,从而培养一种比较开放的胸怀、健全的人格。这也是我们未来的职责所在。”他说。

协同发展 探索多维度社会辐射力

作为上海博物馆新的当家人,杨志刚深感肩负重任,“我们只是文物的托管者,要把它们完好无损地传下去;在

此基础上,创造各种形式让文物从地下、库房、文献中活起来,让世人共享。”他所定义的协同,首先是博物馆部门和部门之间,不同板块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同;然后,博物馆和馆外以及社会 and 高校或科研机构包括其他文博考古机构之间也要加强协同,有了协同才有可能会创新。

上海博物馆今年的重头戏之一是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完成搬迁并正式投入使用。面临着如何确保包括库房、展厅、展柜、储藏柜等空间中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条件符合保护古代书画等年代久远的文物的需要,文博科技中心将担此大任,将由传统的“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

服务社会方面,上海博物馆教育部组织举办的全年讲座平均数量在200场以上,进入社区、学校的手段也很丰富。在寒暑假,几乎每天都能为学生提供一场各具特色的历史文明讲座和艺术体验项目活动。近日,一场《松江邦彦画像》的N个观点”讲座就来到郊区松江的民乐学校梦剧场,引领300多名学生进入邦彦画像背后的松江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上海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则是另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

充分肯定。杨志刚透露,去年在厦门举办的“2014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上,上博典藏立体剪纸系列、数字玺尊获得广泛好评。他透露,博物馆重视研发创意产品,并积极引进社会力量,与高校、名家、品牌联手,“打掉艺术品公司的依赖性,引入社会主体,打开大门,脑洞大开。”除了研发,上海博物馆还计划建设创意培训基地,以起到文创人才孵化器作用。

适时引领 规划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在一座城市中承担的责任,在杨志刚看来用“巨大”这个词不为过。身在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管理全国最顶尖的博物馆,杨志刚要求自己居安思危,要有引领意识。他认为:“世界变化很快,很多事不急着手去做,就有可能落伍。”

眼下,杨志刚正和同事们制定上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5年是明确事业发展方向的关键一年,根据计划,上海博物馆今年全年的工作主要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可移动文物普查、数字化建设等工作展开,强化制度建设,提升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本馆的科研能力、管理能力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而如何“引领”自身跨入下一个阶段,杨志刚谈到了上海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三步走任务。全年参观人数突破200万带来的压力不言而喻,这座空间已显局促、设备又超龄的博物馆首先需要得到修缮。“营造安全舒适的文化空间,不能放松服务质量,要经得起开放管理的更大考验。”杨志刚说。第二步事关建设新馆如何突破瓶颈。在不久前召开的2015陆家嘴论坛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已明确宣布将在浦东建设上海博物馆东馆。杨志刚介绍,这将是一个“一体两翼,联动东西”的宏大规划,将于2016年底付诸实施。而第三步则是回过头来,给这座已有10年历史的博物馆作全面提升,无论是展陈内容还是技术手段方面都将发生深刻变革。杨志刚认为,这未来60年要走好的三步,也正正是适应当下博物馆要拓展文化聚会、社交中心等功能所要完成的重要转变。

观点

7月13日,我国正式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季,很多地方开启了“烧烤”模式。可是此时,有媒体报道,山东某地博物馆在这本应“热”的季节遇“冷”的新闻,不得不引人深思。

据报道,该市7家登记在册的博物馆中,有6家博物馆没有针对暑期学生举办专门的策划与活动。本是吸引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的好机会,也是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却被浪费掉了。实际上该问题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

分析其原因,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不少博物馆并未认识到自身在社会教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观念陈旧,缺乏主动策划相应活动的积极性和愿望来吸引青少年观众走进博物馆;其次,相关人才的缺乏,导致了很多人博物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组织和开展相应的活动;第三,博物馆展陈长年不变,缺乏新鲜感和吸引力,青少年观众不愿意走进博物馆;此外不可否认的是,自2008年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以来,有部分博物馆缺乏工作积极性,活力不足。炎热的天气,也挡住很多青少年观众走进博物馆的脚步。

今年3月20日开始实施的《博物馆条例》强调,博物馆要突出教育功能,应当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学校寒暑假期间,具备条件的博物馆应当增设适合学生特点的陈列展览项目。

对博物馆来说,一方面要让自身变得更有吸引力,可以通过举办适合青少年观众参观的专题展览、丰富展览展陈设施和生动有趣解说等手段,讲好故事,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和能力,培养青少年观众走进博物馆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另一方面要让博物馆“动”起来,组织形式多样的参与体验活动,让他们真正了解博物馆,爱上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文化。

对于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博物馆一方面应予以充分重视,尽快引入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与社会相关教育机构合作开展活动,立足博物馆资源,借助社会机构在活动策划、组织方面的优势和特长,更好地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功能,避免资源闲置和浪费。

资讯

到首博探访3000多年的“北京城”

本报讯 (记者翟群)“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城市,西周时期即是燕国的都城,最早的城址遗迹在房山区的琉璃河镇……”“鼎天隔地·北京从这里开始——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主题展览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身着古典服装的讲解员带领现场观众穿越到了3000多年前的北京城。

该展览分《肇启燕都》、《营建燕都》、《经略燕都》和《逝于燕都》四个单元,以燕都古城为主,从城都选址、营建、经营、古城人物为章节,还原一座3000年前的古燕都城及当时人们的城市生活,向公众展示北京城市最初面貌和古人艰辛的发展历程,追忆往事,思考现实,体现燕都

建城对其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

北京是发展中的国际都市,又是古老的历史名城。经考古论证,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即封召公于北燕,建立了最北方的诸侯国——燕,其所在地就是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燕都遗址。燕国在800多年的进程中,曾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勘察与发掘,便发现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址数百处以及文物数十万件。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是历经沧桑而硕果仅存的宝贵资源,代表着首都北京的文化品位与城市形象,是国际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成都发现唐代园林遗址 疑为万佛寺园林



考古现场,水渠蜿蜒曲折线条灵动。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7月13日从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了解到,在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内的通锦路,发现一处修建于盛唐时期的人造园林遗址,考古研究员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成都千年古刹万佛寺的园林。

今年3月,中铁二局项目在通锦路3号施工,成都市考古队开始抢救性发掘。截至7月上旬发掘结束,共发掘约2500平方米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全长90米的唐代砖砌沟渠和一处人工池塘。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处水渠形状蜿蜒曲折,分岔为两路,最宽处有近6米,最窄处不足1米,深1.6米,砌砖以唐砖为主,间杂有南北朝时期的花紋砖。发掘区北部现存一座砖砌水池,平面近圆形,直径19米,深1.7米。

现场还出土大量生活用陶瓷器和少量与佛教有关的生活造像及建筑构件。这些瓷器以碗、盘、盏、罐、

壶等为主,主要为本地青羊官窑、琉璃厂窑和郫窑产品及少量外地窑口的青瓷器 and 三彩釉陶器。

现场考古队队长易立告诉记者,从发掘情况来看,遗址主体应属于一处唐、五代时期园林式的人造景观建筑群。该遗址毗邻历史上著名的万佛寺遗址,遗址东北侧,曾出土大量的万佛寺石刻造像。自清代光绪以来,万佛寺遗址陆续出土大量石刻佛教造像,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一批珍贵南朝造像多来自万佛寺遗址。

此外,出土的佛像残件及瓷器也表明遗址与万佛寺的相关性,这些瓷器较为粗朴实用,档次不高。易立说:“隋唐五代时期的园林细分为皇家园林、寺院园林和私家园林三种类型,皇家和私家园林使用的瓷器规格应该更高。”因此,此处为寺院园林的可能性更大。

(李倩薇)

中国生态博物馆现况扫描

潘守永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或ecological museum)是将某一特定社区或某一特定区域整体作为博物馆,包括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强调社区历程的整体保护与协调发展的统一。目前,全世界已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分布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以及拉美、日本、中国等地。这些整体性的博物馆,或依托传统村落,或围绕废弃厂矿,或依民族村寨的全貌生活,或反映城市“街角社会的生活形态”,不一而足。一般来说,生态博物馆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文化遗产、资料信息中心、完整的社区保护和发展规划、居民与观众的互动和活动。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

生态博物馆之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来到中国。从1997年开始,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合作,在两国专家的共同指导、参与下,在贵州省的4个民族村寨兴建了生态博物馆。这类生态博物馆由于重在保护与记录少数民族的

文化与传统,故后来被称作“民族村寨性生态博物馆”。此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这种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目前已发展到20多座,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和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目前,在中国,这是一种最为成熟的生态博物馆类型,其“标准配备”是:完整的民族村寨(保留相对完整的民族传统、村寨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等)+资料信息中心+活动。

民族村寨性的生态博物馆,在管理模式或方式上,存在着贵州与广西的区别,因为广西采用了“强化的”业务与行政介入方法,也就是每一个生态博物馆都是在自治区民族博物馆的统一协调与帮扶下建立起来,其在业务工作上以及日常的运营与管理上,仍然与自治区民族博物馆不可分离,即“1+10工程”的模式。这个做法非常类似法国文化遗产部门对全国的“业务指导”(文化遗产官员)方式,也有学者将广西的做法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第二代”。

进入21世纪,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

古镇、工业类遗址以及城市的历史街区或传统社区,也开始尝试建立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被业界誉为“第三代生态博物馆”。诚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并不存在什么代际的关系,这个说法只是就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所进行的概括与总结。所谓的第三代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代表有: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安吉生态博物馆、舟山市东沙海洋渔业文化生态博物馆、平坝县太行古村落生态博物馆、温州市泽雅传统造纸工艺文化生态博物馆以及浙江松阳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等。

目前,全国各地在建和拟建的生态博物馆(云南称作“民族文化生态村”)约有80座。

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成绩单

尽管有一些学者对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咬文生态博物馆持批评的态度,有些批评还相当严厉,认为这个生态博物馆“以保护落后为旨趣”,是文化代理者,生态博物馆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福利,没有带动当地人走上富裕之路。但是,生态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工具在协调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社群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以往任何“机构”和“学术思想”所不及,其成绩也是突出的,是有目共睹的。在遗产保护与社区协调发展方面,尤为明显。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学者与文化官员都坚持认为,从我国经验看,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发挥了至少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 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环境、文物、历史、建筑、景观等遗产。和周边没有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区域相比,更多地保护了传统城镇和村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 促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遗产)的传承、弘扬、发展和保护。在生态博物馆区域,原生态文化保护工作非常明显地好于其他区域,文化



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